



藏族

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Tibetan 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
迪庆州藏学研究院

编



云南科技出版社

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Tibetan 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马建忠 陈 洁 主 编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 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马建忠, 陈洁编著.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5. 4
ISBN 7-5416-2161-7

I. 藏... II. ①马... ②陈...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研究②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研究—西藏
IV. ①K281.4②X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1548 号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经贸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 字数: 32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2.00 元



导言：当代藏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民族文化

马建忠

随着地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人们对现代化物质生活无休止地追求，我们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进入 21 世纪以后，社会似乎进入了更加快速“发展”的轨道，人们的各种行为正不断地被纳入到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理念，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而不愿考虑这种掠夺将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联合国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 30 年中，虽然国际社会在环保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全球整体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全球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大气和江海污染加剧、大面积土地退化、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淡水资源日益短缺、大气层臭氧空洞扩大、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等多方面，同时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使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烈度大幅度增加。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尽管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商品需求的增加，然而自然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与管理，可实现资源量与需求量的持续平衡。千百年以来，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原著民（Indigenous People）大都形成了一整套建立在尊重自然为基础的文化价值体系。这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使人们尊重自然、善待自然，通过各种文化宗教仪式和不同的戒律用来规范自然资源的利用行为，从而保证了生物多样性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了解这些传统文化与知识，并将其运用于解决当前现代生活中许多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已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下，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其独特的文化生态观，青藏高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开始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1. 藏族及其传统文化

藏族是我国少数几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之一，目前 90% 以上的藏族生活在青藏高原，藏区面积约为全国国土面积的 1/4。藏族，自称“博”、“博巴”或“康巴”、“嘉戎哇”，古代汉文史籍称为“吐蕃”。全国解放后统一称为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藏族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通用的文字为藏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拼音文字。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文是约公元 7 世纪，大藏学僧人松赞干布参照当时的梵文字体创制的，横书右行。关于藏族祖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历史命题。大体来说有 10 种说法之多。即西羌说、鲜卑说、印度释迦系说、猕猴和罗刹女后裔说、三苗说、马来半岛人说、缅甸说、蒙古说、伊朗血统说、土著与氏羌融合说等（弘学，1996）。根据解放以来的发现和对历史上“西羌”的考证，最后一种说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汉文史籍记载的最早的人类是居住在今西藏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的“雅隆人”。后来“雅隆人”分成斯、穆、



桐、东四个氏族，加上查、楚共为六个氏族，即六牦牛部落。这一带的藏族先民经过了一段长期的发展过程，进入了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其生产工具十分简单，但他们已经学会了饲养和农耕。而大量的藏文古籍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青藏高原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小邦时代，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6世纪。最后逐渐形成象雄、吐蕃、苏毗三大部落。

世纪前后，藏族先民开始由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7世纪初，雅隆部落首领兼并了苏毗、达布、工布、娘布等部落，藏王松赞干布在今西藏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吐蕃王朝的建立彻底结束了之前各部落之间连年征战不已，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统一后的吐蕃呈现出一个社会相对安定的新局面。通过制定法律、改革吏制、设立新的军事组织等措施，松赞干布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革，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吐蕃逐步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吐蕃王朝还十分重视和周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和中原汉族的交往十分频繁，其影响意义也非常深远。9世纪中叶，吐蕃地区爆发了奴隶和属民的联合起义。加之奴隶主内部混战，吐蕃的奴隶主政权遂告崩溃。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藏族地区陷入了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各部落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属，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发生各种冲突。这时候，藏传佛教已为该地区的统治者所接受，形成了藏族历史上独特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体制。自唐代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以后，从中原带来了大批工匠、艺人、文化典籍、医方药材等。后来金城公主又带来了许多丝绸、谷物及乐队等。宋、元以后，藏族地方政权加强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些地方首领直接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这些为藏族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藏族文化日益发达，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文化史料，仅用藏文书写的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文献，就已浩如烟海，难以计数。由于佛教的影响深远，藏族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藏传佛教的烙印，现存的各种文献中，其中佛经就有四千余种。所以，寺院也成了藏族文化艺术荟萃之所，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渗透着各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教义。

由于海拔高（平均海拔超过4000m），气温低，除了青稞等少数耐寒的作物外，大多数农作物很难在青藏高原生长，因此在大部分藏区，人们自古以来从事一种以畜牧业为主或农牧结合、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藏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知识，如农作物的耕种和收获、牲畜的季节性迁移、森林产品的有效性利用等，都体现出人们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智慧。藏族的居住因地制宜，各不相同，以游牧为主的一般住在用牛毛织成的黑色帐篷里，个别地方也有毡做的毡房。帐篷和毡房雨水不渗，风雪难侵，冬暖夏凉，宜于搬迁，是游牧民族的传统住所。东部农业区的藏族同汉、回、纳西等民族一样，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聚居在一起。这里的住宅主要是两层或三层的土墙碉楼式建筑，墙体夯实，结构紧凑，下层关牲畜，二层住人，屋顶为储饲层，几乎每户都有一香台，每天以燃香柏求平安。设于二层室中的火塘是炊饮之所，也是待客之处。藏族的家庭，多数是以一夫一妻和子女组成的小家庭，一些地区也存在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的现象。农区也有三代同堂的家庭。在牧区，由于游牧生活的特点，子女长到一定年龄，就可以结婚成家，婚后另住帐篷，一般在父母帐篷附近，或单独成家立业；在农区，子女结婚后，一般长子或长女跟父母一起生活，其他兄弟姐



妹到别家上门入赘或出嫁作媳。总之，藏族文明的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青藏高原这种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下，藏民们上千年生产生活的实践和积累。而这些又集中体现了人们与他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紧密关系。

2. 藏区及其生物多样性

地理意义上的藏区主要指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大部、甘肃省部分、四川省西部与云南省西北部地区，面积达 200 多万 km^2 ，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 1/4。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亚欧大陆的中南部，西起于帕米尔高原，东及横断山脉，北界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面积大，跨越的地域广，从东经 74 度到 102 度，东西绵延近 2500km；从北纬 27 度到 39 度，南北延伸近 1200km。广袤的地域、特殊的巨厚地壳、加上独特的地质历史与结构，使青藏高原形成了沟谷纵横、山脉绵延、雪峰高耸、湖泊星罗棋布的独特自然景观。这里集中了我国与亚洲的主要名山大川，如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念青唐古拉山，横断山脉自北而南纵贯西藏东部和川、滇西部；世界性的大江大河雅鲁藏布江、长江、澜沧江、怒江、黄河、印度河等。在青藏高原上还分布着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高原湖泊，如我国著名的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其他的还有纳木错、羊卓雍错等。青藏高原又是世界上冰川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现代冰川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80% 以上。由于青藏高原不仅海拔高（平均海拔超过 4500m），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对全球气候与环境变迁的意义与重要影响，从而使其成为地球上一块独一无二的自然地域单元。

这里的植被类型复杂多样，藏东南的部分热带雨林及季雨林、横断山区的亚热带干暖河谷植被、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面积广的是各种硬叶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暖性及温性针叶林，树线海拔 4000m 以上大都分布的是高山草甸、流石滩、高寒山地荒漠和冰原。藏区生物多样性丰富、生物区系复杂。植物方面，科学工作者在青藏高原进行的十多次科学考察的结果表明，已知整个高原（包括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侧坡）有高等植物 1500 属、12000 种以上，种数占中国维管植物总属数的 50%，总种数的 34.3%；真菌 700 属、5000 余种，约占中国真菌总属数的 82.4%，总种数的 41.67%（李渤生，1994）。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特有种，据初步统计，整个青藏高原有 60 余个特有维管植物属。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地衣、藻类和苔藓植物。动物方面，仅西藏部分有水生原生动动物 458 种，轮虫 208 种，甲壳动物的鳃足类 59 种；另有昆虫 20 目、173 科、1160 属、2340 种。整个青藏高原有鱼类 3 目、5 科、45 属、152 种。陆栖脊椎动物共有 343 属、1047 种，占全国该类动物总数的 43.7%，其中有哺乳动物 28 个科、206 种。鸟类 63 个科、678 种。两栖爬行类 17 个科、163 种（佚名，2004）。

迪庆高原所处的横断山区是整个青藏高原生物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区，虽然总面积不到青藏高原的 1/5，却集中了高原 80% 以上的生物种类（李文华、周兴民，1998）。方震东将迪庆的生态系统类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 6 个类型，



即高山复合体生态系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亚高山湿地生态系统、干旱河谷灌丛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农田-村落生态系统等类型。根据潘发生先生对《云南种子植物名录》及有关文献所做统计,迪庆州有种子植物 187 科、1003 属,4600 种。加上蕨类植物,迪庆州有高等植物 217 科、1074 属、4930 种。由于不断有迪庆州产的新分类群、云南及迪庆分布新记录植物种类被发现和报道,官方的统计数字是迪庆州有高等植物 5000 种。在迪庆分布的植物中,其中有不少是特有种。如玉龙蕨 (*Sorolepidium glaciale*)、食用观音座莲 (*Angiopteris esculenta*)、独叶草 (*Kingdonia uniflora*)、云南黄果冷杉 (*Abies ernestii*)、长苞冷杉 (*Abies georgei*)、澜沧黄杉 (*Pseudotsuga forrestii*)、垂枝香柏 (*Sabina pingii*)、云南粗榧 (*Torreya Yunnanensis*)、川滇高山栎 (*Quercus aquifolioides*)、德钦杜鹃 (*Phododendron nakotiltum*)、宽柄杜鹃 (*Rhododendron rothschildii*)、细穗鹅掌柴 (*Schefflera tenuis*) 等。这里的动物区系具有东西动物过渡、南北动物交汇的等点 (陈锡诚等, 2002), 其中有不少是珍稀濒危动物, 如: 云南仰鼻猴 (*Rhinopithecus bieti*)、戴帽叶猴 (*Trachypithecus pileatus*)、小熊猫 (*Ailurus fulgens*)、水獭 (*Lutra lutra*)、猞猁 (*Lynx lynx*)、云豹 (*Neofelis nebulosa*)、雪豹 (*Uncia uncia*)、马麝 (*Moschus chrysogaster*)、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水鹿 (*Cervus unicolor*)、赤斑羚 (*Naemorhedus baileyi*)、岩羊 (*Pseudois nayaur*)、黑颈鹤 (*Grus nigricollis*)、血雉 (*Ithaginis cruentus*)、红腹角雉 (*Tragopan temminckii*)、藏马鸡 (*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白腹锦鸡 (*Chrysolophus amherstiae*)、双尾褐凤蝶 (*Sinonitis thadina*) 等。

3. 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理论根基和哲学基础,是佛教与藏族地区土生土长的苯教汇合发展的产物。形成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苯教,最初是一种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拜物教。由于藏族生活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高海拔、低氧和寒冷气候,使藏族先民们相比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面临着更加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永远是渺小的。由此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从而又认为宇宙间有一种超自然力——“神”的存在。苯教认为整个世界被大大小小的神控制着,因此这些神也就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和吉凶福祸。自然界中的这些神灵往往神化为具体形象如神山、神树、神水、神湖等等。公元 7 世纪前后佛教传入藏区,之后与本土的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融合,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并被全体藏族人民广泛信奉。对于藏传佛教的自然观,冯智在他的文章中认为藏传佛教将苯教的“万物有灵论”与佛教的“灵魂不灭”观念统一起来,赋予自然以某种生命的象征,形成对一些特殊山川以神灵的敬畏和崇拜,提倡人与自然的顺从和协调的关系。而泽仁邓珠在他的文章中则更进一步指出,佛教的生命观是人与其他生物同处一个生命系统,人仅是这个生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基于这种认识提出“慈悲为怀、利乐有情、禁止杀生、六道轮回、因果业报、普度众生的大慈大悲理论,提倡人心净、众生净、环境净的宇宙美好境界”。因此,现代科学经典的进化论思想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和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潜伏着当代许多生态危机的根源。



尽管大多的藏族可能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和认同现代环保的各种理论和概念，然而青藏高原自然条件的现实和以藏传佛教为背景的文化，客观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态观对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整个环境的保护。在动物的保护方面，徐丽华总结了以下几点：其一，苯教对食用偶蹄类动物和奇蹄类动物有不同认识，同时禁止食用犬科和许多猫科动物；其二，藏传佛教“十善戒律”中的第一条便是“不杀生”，即僧人不杀所有动物，也不准俗人在寺院周围、寺院属地、静坐地神山、神水、神湖周围猎杀动物；其三，广大藏区不食鱼的习俗促进了水生生物的保护。而对植被和植物的保护，藏区广泛分布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规模不等、宗教影响力不同的“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成为了许多物种的“保护地”和“基因库”。陈洁和邹丽关于香格里拉大峡谷内的神山、马建忠对卡瓦格博雪山境内各种形式的圣境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分析。尽管有些分析指数不很明显，但总体来说，圣境内物种的多样度和珍稀度高于非圣境，圣境内植被的丰富度大于非圣境、而且大多数植被在圣境中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同时通过保持水土和保护水源，圣境对维系整个区域性生态系统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郭靖、杨福全、王晓松、和建华等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角度阐述了神山、神林、神水等自然圣境的文化和生态功能。

千百年来，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利用当地动植物及生态系统的技巧、经验及知识，这些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知识同时也构成了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注意到，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藏族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生物命名体系并积累了大量的对这些生物资源利用知识。方震东在其文章中提到了岗曲河流域一带当地土著藏民对各种植物的命名，如黄阳—达翁、帽斗栌—笔伏、卷柏—腊翁、女贞—卡该、天南星—毒瓦、苦刺花—侧那、云杉—农那、冷杉—农阶等 40 余种植物。藏族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知识集中体现在他们在医药方面的智慧。公元 8 世纪晚期的医药大师宇妥·云丹贡布在其著名的《四部医典》中记载了以植物药为主的 1002 种藏药，而在后来的《晶珠本草》里，桑杰嘉措等记录了 1400 种藏药，并对各种所用植物的生境、形态、产地作了详细描述。藏药具有明显的藏族文化特色，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了包含 191 科 692 属 2085 种植物药、57 科 111 属 159 种动物药、80 余种矿物药（总计 2324 种）的庞大药材库（孟珍贵，2003）。除此之外，藏民们还积累了大量利用其他野生蔬菜（如竹叶菜、香椿、蕨菜等）、果品（悬钩子、鼠李、十大功劳、木通等）和菌类（松茸、羊肚菌、鸡油菌等）的知识。由于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这些生物资源一直处于一种可持续利用的状态。

4.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

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有科学家预测全世界 20% 左右的现有物种将可能会在近 30 年内消失（Wilson, 1992）。科学家们进一步指出，现已发现并已进行科学命名的物种可能只有地球总物种数的 10%，而大量的物种甚至在没有命名和进行科学研究前就可能已经消失（Raven, 1999）。生物学的研究表明，尽管整个地球演替的历史伴随着生物物种的不断消亡，但在近代，由于人类对自



然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强度的加大，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生境的干扰和破坏，物种的消亡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以哺乳动物为例，在17世纪时，每5年有一种灭绝，到20世纪则平均每2年就有一种动物绝灭（许再富，1991）。就鸟类而言，在更新世的早期，平均每83.3年有一个物种绝灭，而现代则每2.6年就有一种鸟类从地球上消亡（许维枢，1992）。与此相应的是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语言或方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化多样性指标，它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文化存在的条件、知识的传承、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当今世界存在约5000~7000种语言或方言，然而语言学家估计在将来不到50年的时间内将会有一半的语言消失（UNESCO，1993）。因此人类文明的进程带来的不全是积极的后果，特别对环境而言。大规模地对环境系统的人为干扰、大量经济物种的消失、水体和空气的污染都是来自于人们逐渐失去控制的贪欲。或许人口激增、过度消耗、城市垃圾等各种影响环境的主要因素都可归结为工业社会对全球市场的竞争所导致，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原著民及本土社区正在逐渐放弃或失去其传统、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加剧了人类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人们在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不断增强，科学家从环境生物科学的角度做了许多定义，并被用于科学分析、制定相应环保策略等。在我国，引用较为普遍的是蒋志刚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蒋志刚，1977）。学术界关于自然的评价大都基于两种最基础的理论即“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前者关注自然的经济效用，提倡对自然要素评估采用商品价值体系；后者认为自然要素有其“内在”或“本身”的价值，因此人类要采取保护手段，以保证其存在。这两种理论往往使“生物多样性”的讨论走向两个极端：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环境主义者过分夸大自然要素的“内在”价值，从而主张自然的完整性，反对经济利用；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在关注自然资源的经济功效时，往往忽视了自然的生态社会功能。然而，生活在世界各地、千百年来依靠其周围的自然资源的原著民，可能对当今时髦的“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词闻所未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尊重自然、不珍爱生命，相反，他们对物种多样性、群落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有着更加广泛的理解，这些理解其最主要的特点是体现了一种人、自然与精神世界深层的内在联系，自然其实已经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对他们而言，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被“保护”或被“开发”对象，而是整个宇宙生命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片面地理解“生物多样性”有可能把人们的文化、信仰与自然的有机关系生硬地剥离开来，更糟糕的是这种理解忽视了人们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被简单地理解成人们对生活的知识和行为态度，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加以实践。自古以来，这些知识和行为态度通过交流、各种象征符号、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传统信仰和社会形式等得以传递。虽然“环境决定论”（即人类文明的进程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有明显的缺陷并早已被其他许多理论所批判，但客观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是不争的现实。事实



上，对于世界上的许多原著民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精神的世界，自然是这个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许多传统的信仰系统中，自然界里的每一种事物都被赋予了灵性，并要求人们尊重所有的生命，这包括自然界里的动物和植物。通过有限度、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未来。因此，尽管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诸如“自然”、“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等词汇，但是并不是它最初发现的这些概念。早在现代文明到来之前，土著的、传统的社区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动植物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过人们千百年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活动，构造出其周围的环境，同时他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又是对所处环境的一种积极适应。大量的研究表明，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地球上的许多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才得以保存。仅以地处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例，西部的白马雪山由于解放后大规模的政策性采伐及后来的商业采伐，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为了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国家迫不得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建立了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仅一江之隔的卡瓦格博（梅里雪山），尽管区域内的人口密度大于白马雪山，生物多样性资源却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与卡瓦格博雪山在该地区的文化宗教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人类认识自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有效的手段，然而也使人们越来越从技术与经济的层面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传统实践是合理的，我们并不提倡对乡土知识的“浪漫化”（Romantization）。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人类对自然的复杂感情并非仅能以“与自然和谐”或“热爱自然”所能涵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是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事实上，这些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现在看来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因素。如藏族，徐丽华在其文中分别从历史上的法律条款、传统服饰和药物利用大体总结了这些不利因素。但总体而言，在 21 世纪科学和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权威学者已经认识到单纯的现代科学并不能解决现在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相反在某些时候却成为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因此，科学应该认同和尊重传统知识中积极有效的部分，同时我们更应该倡导一种建立完善知识体系的社会氛围。全球性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促进了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传统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并意识到对传统知识和文化研究及整理工作的重要性（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et al. 1992: 21）。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负责环境项目的克劳斯·托普菲尔指出：“了解、尊重当今土著民及传统社区居民，并在环境与发展项目中充分考虑他们（的智慧与权利），将会被证明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必不可少的条件”（Posey, 1985）。2003 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世界公园大会”（World Parks Congress）更是在其条款 5.26 中敦促世界保护联盟（IUCN）把社区传统保护地作为其保护区分类体系的一部分（Brosius, 2004）。结合传统知识和组织结构实施环境保护与发展项目有许多优势，重要一点是传统知识提供了基层决策的基础，而决策又大多发生在社区层面的传统组织。通过这些组织识别具体问题，能大大加快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尽管目前还十分缺少对民族生物和生态知识全面系统的调查，但近十几年来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原著民对生态分区、自然资源利用、农业、水产业和林业等有着远比



我们想像得多的经验和智慧，对这些生产实践和传统知识的了解与尊重，并从法律的高度加以确认，将使人类的发展更能兼顾生态与社会效益。

5. 关于本书

2004年6月，100多名与会者出席了在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召开的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会议。此次会议由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举办。与会者有州县政府官员、宗教领袖、村民代表、知名藏学学者、自然保护区工作者，也有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学者和相关组织。此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加强对藏族文化现状的了解和藏族文化在藏族地区特别是滇西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角色的认识。会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研究者、环保工作者、当地政府官员和村民就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本书入选的论文均为参会者为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这些论文分别从藏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保护、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和对将来保护工作的建议与展望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述。论文不仅涉及藏传佛教、藏族的人文风俗、传统自然资源利用及管理中的环保理念和知识，同时还针对当前我国的西部开发、旅游业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从国家政策与法律的高度分析了如何将发扬藏文化优秀传统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为了阅读方便，编者将这些论文归入三个部分，即第一部分“藏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第二部分“藏族文化中的生态保护理念及其价值”；第三部分“藏区的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由于汇编、审定时间短，难免有疏漏之处；加之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有部分论文未能收入本书，并对一些文章作了删节，敬请作者、读者谅解。



目 录

导言:当代藏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民族文化 马建忠(1)

第一部分 藏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

云南藏区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 潘发生(3)

迪庆的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 方震东(10)

藏族传统文化对香格里拉大峡谷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初探 陈 洁 邹 莉(22)

白马雪山保护区北部藏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格玛江初(27)

卡瓦格博(梅里)地区的自然“圣境”和生态保护 马建忠(33)

云南少数民族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欧晓昆(41)

藏牧民生态知识与牧场管理 Kenneth Bauer(47)

藏族民间医药与生物多样性

——以云南省德钦县永芝村为例 孟珍贵(53)

第二部分 藏族文化中的生态保护理念及其价值

试论佛教中观学“缘起”思想的生态价值 印 照(61)

藏族苯教文化在自然保护方面的作用 和建华(68)

藏区神山崇拜与生态保护 王晓松(73)

从藏传佛教的自然观看生态环境的保护 冯 智(83)

藏族、纳西族的人与自然观以及神山崇拜的比较研究 杨福泉(90)

香格里拉藏族的传统环保观 何耀华(97)

环境思想的变迁和中甸民间生态观刍议 萧亮中(100)

喜马拉雅山区宗教的生态分布 夏 敏(110)

人类与青藏高原 三智才让(116)

藏族丧葬文化与环境保护 祁继先(122)

云南藏族的神山信仰与村民生计方式研究

——以雨崩村为例 章忠云(129)

自然圣境的意义 郭 净(137)

霞给藏族文化生态村:从构想到实践 马秀妹(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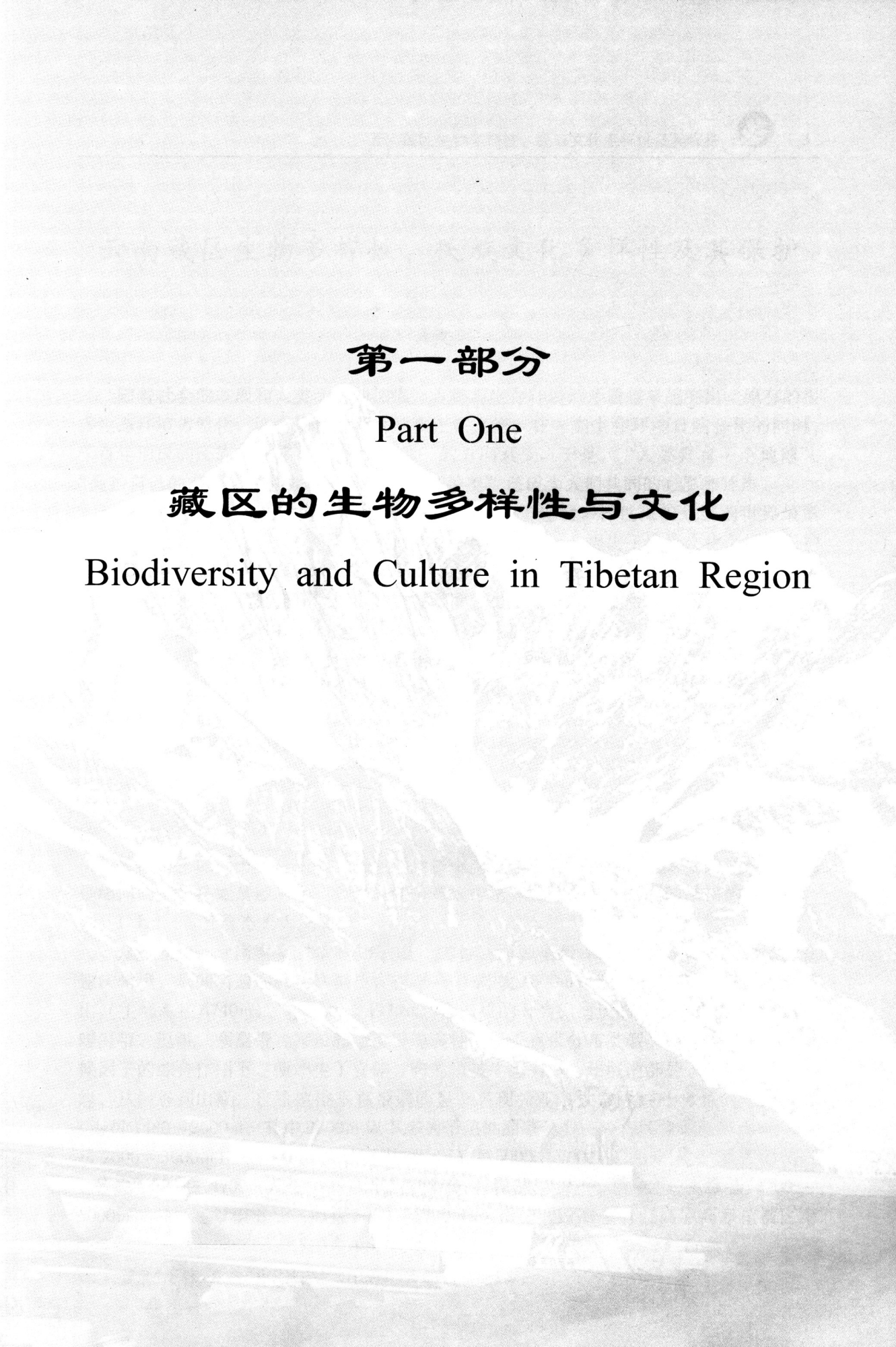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藏区的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的区域自然保护与文化保护

——一个人人类学的分析 庄孔韶(149)



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	降边加措(156)
藏族的生态环境保护观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得荣·泽仁邓珠(164)
自然崇拜的宗教规范和环保法律浅议	王达人(171)
藏族传统生物保护意识及其生物保护立法问题	徐丽华(176)
和谐之度	
——香格里拉文化中的一些生态保护潜规则的思考	刘 群(183)
迪庆州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刍议	荣坤·奇林旺敦(187)
理想与现实联结点上的香格里拉	齐扎拉(192)
迪庆州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陈建国(198)
“藏族传统文化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总结	(203)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陈 洁(214)



第一部分

Part One

藏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

Biodiversity and Culture in Tibetan Region

